

附：汉代合浦港考古侧记*

2002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二），这个日子几乎凝固在我的脑海里。这一天，为我所在的广西文物工作队一个名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的小课题，与同事韦革、覃芳从首府南宁出发，乘车抵达200千米开外的合浦县城，与县博物馆副馆长王伟昭——课题组的第四位成员会合。寒风料峭，我们沿着西门江，在县郊的草鞋村遗址一带作实地勘察。我们时而疾走，时而驻足交换意见。虽然踏上了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却全然不知能走多远，但我的心里暖意融融，洋溢着对未来发现的憧憬。

时光荏苒，恍若白驹过隙，一眨眼就是15个春秋。期间，从单位课题升级到文化厅课题，再升级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后结项；期间，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从乏人问津到学术界热点；期间，我们取得了多项重要发现，在国内外出版和发表不少研究成果，从社会各界也得到了诸多褒扬。但我更愿意相信，不是我们的研究做得多好、做得多深入，更多的是，大家出于对充满诗意的“丝绸之路”的喜爱，是爱屋及乌的缘故罢了。因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更多、更艰巨，我们必须时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也是本人继发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的考古学探究》之后，另文从侧面记述历年探索和思考历程的目的。

一 一个值得考古工作者奋斗的课题

时广西文物工作队，行政挂靠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虽为部门，但一直相对独立运行。队里有不少年轻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名校的考古学专业。队领导蓝日勇、谢日万想通过课题，把青年学者培养起来尽快独当一面。跃跃欲试的人群中，我便是其一。在这次设立的5个课题中，坦率地说，合浦港这个课题争议最大。一些老同志认为，不会有啥新突破，别再折腾了。我人轻言微，最终，还是文化厅文物处的某位领导定了调：让年轻人试试嘛，不试怎么知道！就这样，课题才得以通过，我便成了这个课题组的组长。此后，广西文物工作队更名为“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到独立单位“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唯一不变的是，历届班子乃至文化厅领导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毕力排解我们的各种压力和困难，十年如一日地给予全方位的支持。这是题外话，就按下不表了。

立项之前，我一直坚信，这是一个值得考古工作者为之奋斗的课题，而且不断地向课题组成员，向各级领导“游说”。心里最初的一股劲，源自当时中国学术界掀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热潮。1987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项目的十年规划，于1990年10月至1991年2月间，开展有中国学者参与的从意大利威尼斯至我国广州的海路考察活动，还在泉州召开主题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泉州最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和支持，并直接与当年“丝绸之路”通商国开展商务和旅游往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余多地也出于打造文化品牌、提高城市知名度、促进经济发展等目的，为论证当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相继召开全国性、国际性的研讨会，大规模组织专家、新闻媒体进行考察宣传。2000年8月，广东省组织“著名的文史学家、地理学家、海洋学家、文化学家、作家和记者”一行二十人到徐闻考察，十多家媒体进行大规模报道，之后还召开了研讨会；2001年12月宁波邀请五十多位专家召开“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研讨会”，会后达成“宁波共

识”，其中提到在与广州、宁波、泉州达成共识后，拟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众多声音中，合浦作为最早的最重要的始发港之一，似乎已被漠视，这对于广西考古工作者来说，情感上无论如何都有点难以接受，我总觉得自己应该也可以去做点什么。

当然，研究不能光凭热情和冲劲。课题立项之时，我已在这个行当浸淫了十多年，虽一直翘翘于考古问道，但也积累不少实践经验，脑子里有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我分析，这个课题至少三个方面可以“为”，一是《汉书·地理志》作为正史，对这一航线有明确和较为详尽的记载，可信度很高。任何相关考古遗存的蛛丝马迹，对该项研究而言，都可能是突破点；二是自1957年以来，在合浦发掘的都是汉墓，城址一直没有发现。作为一个完整聚落，“活人住在哪里”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这个缺憾，我们应该能作些弥补；三是以前找寻合浦港，方向、方法欠妥。汉代人口稀少，港口不可能脱离城址单独存在，港城应为一体。由于考古学的局限性，不管港口码头能否保存下来，只要找到城址，以城址来判断港口的地理位置在学术上是大体成立的。而找城址，还是得回到基础工作较好的汉墓中来。按照聚落布局的基本规律，居址应就在墓葬群附近。

二 发掘并确认两座汉代城址

课题立项后的前两个月，我们就埋进书堆，查找大量资料，包括史籍、地方志及以往的研究成果等。一通准备之后，2002年6月，我们从北部湾入海口溯南流江沿岸开始了拉网式调查，一路往北，步行近百千米，到达浦北县旧州镇，然后再折回作重点调查。为什么要沿江呢？这是因为为了生产、生活、交通等方面的便利，人们通常选择在河旁居住，古今大抵亦然。

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在距县城东北约13千米的石湾镇大浪村古城头村民小组至石康镇多葛村，这个长约1500、宽约200米的狭长沿江地带，发现了大量的刻划纹和几何印纹陶片。这些陶片有十多种纹饰，拍印清晰、纤巧繁缛，与之前当地西汉晚期墓所出迥然不同，经与广州等地出土遗物比较，我们认为其年代当属西汉早中期。这一地带的南侧，就是大浪古城。该城址于20世纪60年代被文物工作者发现，1981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之前工作尚未深入，古城的年代被笼统地定为“明以前”。古城边长218米，呈正方形，城墙及护城河还清晰可见，城墙基本为正北方向，从断面观察，土质纯净，无包含物，应系挖护城河生土上筑而成。几番细致调查之后，我们几乎肯定，这是合浦地区同时期的唯一的一座城址，并且凭着职业敏感，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是西汉中期始设合浦县的治所，而且由于河流淤积改道，古城临江西面可能还有码头之类的遗存。

很快，课题组主题为“合浦港的寻找可能面临重大突破，几代文物工作者的努力有望结出硕果”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自治区文物部门和市县领导多次到现场考察，还相继两次召开包括镇、村级干部参加的考古协调会。总算是水到渠成，2002年9月4日，试掘工作终于正式启动。自治区文化厅追加课题经费3万元，县政府为方便考古工作，还拨专款修筑了从河堤通往古城的简易公路。至2003年4月28日，考古工作暂告一段落，前后历时8个多月，其中发掘的时间就有近4个月。通过发掘，发现了城中央的建筑遗迹和西门外的码头，对城的基本布局、构筑方式和年代有了初步的判断。码头用黄土筑实，平面略呈葫芦形，东连着城墙，西面伸出河道。东西长7.4米，南北最宽约3.5米。背水一面还有两个残存木屑的柱洞，应为固定船只之用的木桩残余。

大浪汉城址考古发掘的初步发现经媒体甫一披露，在区内学术界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同志认为，没有砖瓦残片的发现，不是汉城。“秦砖汉瓦”在一些人的思维中已成定式，但我们知道，始建于西汉中期的桂林兴安七里圩王城，才开始使用筒板瓦等建筑材料，而大浪汉城址地处边陲，稍晚出现也很正常，折射出当地发展的滞后，也吻合汉文化往南推进的历史进程。码头的反对者亦众，一些地方文史学者甚至放言是“把乌鸡说成凤凰”。他们以现代的眼光，认为合浦既然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应是商贾如云，货如轮转，码头怎可能是这么一个小家伙，与想象的差距太远。不过，对于考古学而言，码头地层叠压清楚，虽经漫长岁月，夯筑的平台、台阶及其相连的伸出江面供停靠船只、装卸货物的船步都清晰可见。船步与现代沿海沿江港口伸出水面的码头，原理是相同的。14C 测试的结果，也大体框定在西汉中期前后，即是合浦始设郡县的时间，当与合浦港密切相关。

于我看来，观点分歧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永远无法、也没必要统一思想，没有争论就没有学术的进步，但是，如果争论不回归正常的轨道，不写严肃的学术文章，光靠搬弄口舌，试图众口铄金，其实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大浪汉城址的断代分歧颇大，有说战国的，有说唐宋的，更有说明代的，当中不乏名气很大的业内人士，以致在发掘之后数年，当地文博工作者还是无所适从。直到 2012 年前后，国内一位著名的汉代考古专家来到城址现场，据说她察看一会，就肯定地说，是汉城，没有问题。陪同的当地同行，马上很高兴地打电话告知我。我只能苦笑一番，因为这根本无须劳烦著名考古学家，具备基本的学科实践即可做出判断。大浪汉城址的筑城技法明显源自中原，如方正的布局、夯筑的城墙等特征，与中原及关中地区早期及同时期的做法相类，应是汉武帝平定南越、郡县制得以巩固之后，受强大的汉文化影响所致。流言蜚语有时让人气馁，但我从未考虑过放弃，甚至没有太多时间沮丧，只有继续完善相关的资料，所以，从 2011 年 11 月起，我们扩大发掘面积，又发掘位于城址北面约 700 米的土墩墓。这是岭南首次确认的土墩墓，也算是为与城址相关的墓葬区找到了线索。

另一草鞋村汉城址，于 20 世纪 80 年代调查发现，1993 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定为“窑址”。发掘的机缘很是巧合，2007 年，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吴春明教授来联系本科生的田野实习，与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推进课题研究的初衷不谋而合。发掘计划上报国家文物局，很快就获批准。之后广西师范大学陈洪波老师率考古与博物馆学方向的几个硕士研究生也加入进来，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小的考古队。次年两校老

师王新天、刘淼、陈洪波等又率下一届学生继续实习，这样，2007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 月，我们对位于遗址西北部的“窑址”共开展两次大规模的发掘，之后为补充资料，考古所还进行了数次小规模发掘。主要发现是一个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包括炼泥、囤泥、制坯、晾晒设施以及附属建筑等，几乎囊括了整个工艺流程。出土不少制陶工具，也是作坊的重要证据。

2010 年 5 月，县里在穿过遗址的人工河的另一侧修筑河堤工程，意外地发现一处大型的建筑遗迹，闻讯后，我们立即着手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大型建筑遗迹的发现，大大提高了我们之前对发掘成果的预期。保存下来铺方砖的走廊，长约 63 米，宽 2 米。长廊西南端接一方形亭子。这个规模，很有可能就是城内衙署之类高等级建筑的局部。联系之前发现的作坊区，其位于城址的一

角，与许多汉城甚至汉长安城的布局相类。出土的大量建筑材料，当是为就近满足城市的建筑需求。既然可能是一座城，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考古勘探确认。工作还算顺利，我们发现了城墙和护城河，城的轮廓就基本清晰了。城址周长约 1300 米，东、南、北三面城墙较平直，有护城河环绕，并与西门江相通。这种利用河旁台地，一面临江，三面开挖护城河与江河相通的布局与大浪汉城址相似，都是凿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相连，进而集城市用水、护城防御和航运于一体，显示两城是一脉相承。草鞋村城址也是合浦境内发现的唯一同时期的城址，从其规模来看，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米，是推测为县城的大浪古城址的两倍多，等级应更高，应是东汉时期甚至早至西汉晚期合浦郡的郡城。

草鞋村城址一带从汉代至今的两千多年间，人类的定居和生产活动几乎没有间断，破坏很严重，表现出的叠压打破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为了做到每一步工作都没有大的纰漏，我们多次邀请区内外发掘汉城经验丰富的专家前来会诊，国家文物局也派出由黄景略、徐光冀、焦南峰等先生组成的专家组到工地指导发掘工作。2009 年 1 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还把“两广考古工作交流会”放在现场召开。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对我们帮助很大，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已故的麦英豪先生。2008 年 1 月，麦先生携夫人黎金由时任广州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冯永驱等陪同前来考察草鞋村遗址，当时发掘工作刚告一段落，发现了窑床和手工作坊遗迹，出土一大批筒板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和其他遗物。麦先生很是高兴，次日在广西博物馆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对着在座的蒋廷瑜、韦仁义、黄启善、黄云忠、谢日万等广西专家，毫不掩饰其兴奋之色，呼吁一定要继续开展田野工作。有同志对前期工作和初步结论有些质疑，他诙谐地回应：“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考古才好玩。”从工地到座谈会，麦先生谈了许多意见，而且回去刚两天，就给我写来一封亲笔信，密密麻麻写满了两张信笺。来信中他强调草鞋村的发现是突破性的，在岭南地区是唯一的，在全国同类遗址中也有地域特色。对于下一步的发掘工作，他给了五条具体意见。信末，他希望我下一步以此为工作重点，要抓紧，发掘时天天在场，全面掌握，而且要记住“发掘就是破坏”这个警句，做到细微不漏。

除天时地利人和，有同行说过，考古发现永远不乏运气方面的故事。确实，作坊发现就有点运气的成分。在第一期发掘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窑床背后发现了两个坑，很像是与制陶相关的工作坑，但若扩方，就是一个几亩的鱼塘。抱着试试的态度，我找到在工地当民工的鱼塘主商量，说我们想抽干水，清清鱼塘底部，就下挖 30 厘米左右，可以给他补偿，但考古队经费不宽裕，只能给 2000 块钱，没料到这个热心的老乡居然爽快地答应了。抽干水，晾晒几天后，我们就动手清理塘底的淤泥，刮干净后，好家伙，密密麻麻，井然有序的沟、坑、池、井就出现在眼前，着实让人兴奋好长时间。

耗时十年多，通过对两城址的初步发掘，基本上回答了“活人住哪里”的问题。大浪汉城址使用的时间短暂，自西汉晚期起，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合浦的政治中心随之顺江南迁，至距现海口约 10 千米的草鞋村城址一带。两座城址的发现和确认，对于寻找港口位置和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意义非同一般。有鉴于此，2013 年，大浪古城和草鞋村遗址被同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发掘前，这两处还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草鞋村遗址更是从县保直接升国保的。很快，这两座汉城址与合浦汉墓群一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北海段申遗的三个遗产点。客

观而言，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课题组多年以来开展扎实的考古基础工作直接相关。

三 解读汉墓发现的宝藏

合浦汉墓群是目前国内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墓群之一。墓葬群位于县城一带，分布面积约68平方千米，现存封土堆1056个，估算地下埋藏墓葬近万座，是汉代合浦港繁荣最直接的历史见证。1957年迄今，发掘的古墓已超过1200座，其中以汉墓居多，部分为三国、两晋和南朝墓。汉墓出土文物主要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和珠饰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大量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各类珠饰以及波斯陶壶等舶来品。

摆在课题组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与之前设想一致，是墓葬资料的整理。当时已发表的合浦汉墓资料，仅占发掘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大量则积压在有关单位的库房里，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们知道，作为考古学研究，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是绕不开的基础工作，是必要的一环。为此，我们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把墓葬资料分2005~2008年和2009~2013年两部分开展整理，个别重要的墓地如寮尾墓地，则单独编写报告。整理工作的辛劳，相信从业的同行多有体会。腰酸背痛自不必言，常常是白天承担繁重的野外工作，晚上挑灯夜战，压力确实很大，以致入睡前还感觉到那些出土器物在脑子里晃动。不管怎样，至2014年8月，终于完成了近300座墓葬的整理，并陆续发表出版。如此一来，一手资料丰富了，也夯实了之后深入研究的基础。

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物是研究的重点。此前除玻璃器和金花球等少量器类外，其余多未明晰或仅局限于一般性的介绍，很难让人感受到这条远洋贸易通道的真实存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充分发挥考古学“证史”“补史”的作用，结合科技测试分析成果，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让文物说话，使《汉书·地理志》有关记载透过实物得到证实和补充。

切入点为玻璃器。玻璃不同于水晶、玛瑙、琥珀等天然材质，是人造材料，其主要化学成分、特征微量元素等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进行检测和分析，从而为判断其产地提供科学依据。2008年9月，我们与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合作，选取了100多份合浦和贵港汉墓出土的玻璃样品，进行无损分析。测试分析的结果表明，合浦出土玻璃器的成分有多个体系，除钾玻璃外，还有中国自产的铅钡玻璃、铅玻璃以及首次证实来自罗马的钠钙玻璃。钾玻璃占七成以上，主要在当地自制，部分中等钙铝和低铝的类型来自东南亚和印度等地。汉代合浦虽地处边陲，一般文化科学技术都落后于中原地区，唯独玻璃容器的制作水平高于中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研究还表明，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早期贸易，对合浦玻璃技术发展有重要影响，除直接输入印度、东南亚所产的钾玻璃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对外来玻璃制作技术的吸收和发展，形成本地生产的钾玻璃体系，并随着印度—太平洋贸易珠向东传播，影响遍及东部沿海，甚至到达日本、韩国等地。

测试也首次确认蚀刻石髓、石榴子石和绿柱石珠在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中的存在，再加上水晶、琥珀、玛瑙、肉红石髓、绿松石、包金铜珠和金饰等，我们共梳理出10多个类别珠饰，它们或直接来自海外贸易，或受外来技术影响当地自制，或是进口原材料加工，甚至还有部分可能是域外定制。从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熏炉及炉中的残留物分析，香料应属输入“奇石异物”中一类。国内首次发现的波斯陶壶和铜钹作为非贸易品，随之流入。此外，合浦汉墓的叠涩穹隆顶形制以及汉墓出土的胡人俑、羽人座铜灯以及反映佛教海路传人的钵生莲花器等，也是域外文化因素影响

和植入的重要物证。最后，我们把合浦出土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物，概括为在我国汉代考古发现中的三个“最”，即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为主要珠饰之类的奢侈品贸易。进入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碧海丝路”展厅，从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到晶莹剔透的水晶和绿柱石，再到温润澄净的玛瑙、肉红石髓和蚀刻石髓珠，熠熠生辉的黄金饰件，不少观众感觉宛若进入一个高级珠宝卖场。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焊珠金片，长仅2.1厘米，宽仅0.4厘米，上面就焊接有约200颗金珠，直径最小的仅0.1毫米，高倍显微镜之下，无异今日之微雕，其精湛工艺令人击节兴叹。就连毫不起眼的琥珀，在古希腊，一件动物小饰件，就能换一个奴隶。虽说海路的输入抵达北部湾地区后，最终的目的地还多是辗转至汉都长安和洛阳，但合浦因海外贸易发达而出现数量庞大的珠饰，对于当时的京畿地区，还是一般阶层难以企及的奢侈品。比如，在西安近百座东汉墓中，仅见32颗玻璃珠、29件玻璃耳珰和1枚双锥形金串饰；洛阳烧沟225座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的墓葬中，也仅见水晶珠和玛瑙珠各1颗、琥珀珠4颗，玻璃器也很少。这些发现，放在合浦汉墓中，确实不太起眼。光是玻璃珠，单座墓葬往往就出土数百甚至数千颗。

重要发现当中，有两件舶来品，都被誉为“镇馆之宝”，它们的发现和“出炉”经过，也很值得记述。

一是2008年10月发现的波斯陶壶。出土的是一座砖圜墓，盖板早已腐朽。这座墓在历史上曾遭盗掘，盗洞直达底部。巧合得很，波斯陶壶所处的墓室一角，不知道盗贼是出于安全考虑，抑或其他原因，总之连同其他一批器物幸存下来了。这件器物出土时很不起眼，被挤压扁平，碎成了几十片。修复过程中，技术工人石武还时不时抱怨，因为这件壶属于低温釉陶，茬口很难对齐，要讲技术，更要有足够的耐心，他花了两周左右时间，才粘补好。完整器物终于摆在面前，汉代低温绿釉陶我之前在河南博物院见过，对其中高大的陶楼印象深刻，但类似造型国内同时段似无发现。当时确实不敢往波斯陶上靠，因为之前扬州等地的发现晚至隋唐，是几百年后的事。于是，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先生求教，想不到很快就有了回音，白先生说这类陶壶在波斯古国属地现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西南部有不少发现，我急忙找来伊拉克塞流西亚遗址出土的器物比对，果真如此，甚至与其中1件现存叙利亚国家博物馆的陶壶，几乎如出一辙。为稳妥起见，白先生还安排我们取样本送所的科技中心，测试釉面和胎的化学成分等。分析结果表明，与我国古代多种陶瓷釉的化学成分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体系，而与西亚的发现相类。至此，我们才在展厅的器物说明牌上标注“波斯陶壶”，代替比较学术的“青绿釉陶壶”，让一般的观众都可以直观感知这件难得的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合浦的舶来品。

尽管这类陶器在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都有收藏，但因其易碎，不容易运输和携带，在印度、斯里兰卡和泰国同期的港口遗址中发现的都是残片，无法拼复。合浦出土的这件，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唯一的一件汉代器物，弥足珍贵。资料在《考古学报》刊登后，还在《考古》中、英文版发表了这件陶壶的研究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大英博物馆的一位西亚古物专家还委托合作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年轻学者黄珊，一定要她专程来合浦看看出土波斯壶的墓葬地点。由于是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所在的地点建起了工业园，墓葬早已回填，但这位英国同行坚持要黄珊来，就算是考察墓葬的周边环境也好。我记得黄珊当天来，次

日返京，在合浦逗留的时间不足 24 小时。不过，总算了却这位英国专家的一桩心愿。与波斯陶壶同出的，还有 1 件铜钹，荣登了 *Antiquity*（英国《古物》杂志）的封面。这件铜钹，无论是纹饰，还是其种铜成分，都赋予了强烈的中亚文化色彩，显示可能为同一来源。此外，该墓还出土有琥珀、玛瑙和水晶珠饰，以及胡人俑座灯等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文物。因此，学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客死他乡的波斯商人，亦不无道理。

另一件是罗马玻璃碗。2016 年底，当时我供职的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建成新标本陈列室，布展完成不久，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了这件色彩斑斓的玻璃碗。它与之前广西发现的多件蓝色、青色基调的玻璃杯不同，外形也有所区别。经核实，得知出自 1987~1988 年发掘的合浦文昌塔汉墓，当时为配合南宁至北海二级公路的建设，在公路经过的文昌塔墓区发掘了 200 多座汉墓。遗憾的是，由于发掘时日已久，墓号和伴出物等重要信息均不清楚，而且之后正式出版的发掘报告，也没有把当时作为小件、分开放置的这件重要器物归入。

汉代玻璃碗在国内的发现很少，此前广州和扬州报告过两例，很可能是产自地中海地区的钠钙玻璃，但我没见过实物。我把照片发给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李青会博士——我信赖的多年的合作者，请他协助查找国外相关资料，没几天，他就告知我，发现了两件颜色、大小和外形都十分相似的器物，分别藏于日本美秀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登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网站，发现他们的藏品还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是塞浦路斯 1963 年出土，介绍为公元前后的罗马玻璃，仿自西方人喜欢的琥珀颜色。通过类型比较，对于合浦这件器物的来源，我们心里有了底。

2017 年 3 月，合浦汉文化博物馆承接重大展览任务，自治区文化厅把该馆展览提升和讲解员培训任务交给我刚就职的自治区博物馆，我提出借考古研究所这件玻璃碗充实展品。由于时间紧迫，为在展板上表现内容准确，讲解起来更有把握，我临时请了广西民族博物馆的文保专家覃椿筱，用便携式 X 射线衍射仪作初步检测。该仪器虽无法检测出钠，但检测结果明确了钾成分很低，排除了属我国华南、东南亚和南亚这一广大区域内生产的钾玻璃的可能性，结合器物型式，我们判断应是地中海地区生产的钠钙玻璃，俗称“罗马玻璃”。这件在库房躺了近 30 年的宝贝，终于随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从汉王朝使团带去黄金和各类丝织品，再到东南亚、南亚国家输入的各类珠饰，又再到或经由南亚和东南亚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间接贸易输入的罗马玻璃珠、玻璃碗、波斯陶壶和铜钹等，我们通过对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使得这 2000 多年前正式开通的远洋贸易航线不断清晰，并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同。2017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考察调研，首站就视察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总书记肯定该馆围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展出的文物有特色。这一高度评价，给了我们莫大的荣耀和巨大的鼓舞。特色展览的背后，无疑是考古工作者包括早期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历时 60 年的辛勤付出和持之以恒的基础研究。

四 肩负新时期伟大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广西后不久，在 2017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总书记发表了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明确提到了北海古港，这是国家元首首次在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上肯定了广西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历史地位。

目前，北海与我国沿海各个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联合，正着手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作为最早的始发港，北海合浦是国内整个线路申遗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据此展开的考古学研究，深入挖掘合浦港突出的普遍价值，为下阶段的文物保护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提供有力的学术之撑，也是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一种软实力，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肩负新时期伟大的历史使命，社会各界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的要求，也就更高、更迫切。历年我们虽做了不少工作，但该研究涉及地域广，跨国家多，跨学科众，研究上存在较大难度。前期的一些初步成果，尚需置于今后的考古新发现和庞大复杂的中西交流网络予以证实，两城址和汉墓群的发掘与研究也亟须加强和深入。因此，同志仍需努力。

* 相关内容曾在以下报刊或文集发表，本次刊登作较大改动。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考古侧记》，《文史春秋》2017年第6期；《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的考古学探究》，《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5日第5版；《两件“镇馆之宝”发现记略》，《中国文物报》2017年10月10日第3版；《麦英豪先生给我的两封亲笔信》，《广州文博·麦英豪逝世周年纪念专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94~197页。